
序 言

——はじめに——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惠泽四方，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尤其深远，汉唐以来甚至远播欧洲。东亚各国既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亦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加以融合，各具特色。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在文化上则是表现在各民族文化的勃兴与互动的俱进。中国自 1978 年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作为整体性社会大变迁中的文化亦得以全面复兴和发展，并受到世界、尤其是有着传统文化亲缘的亚洲邻国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在这种大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化，乃是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与亚洲·世界的文化共生”研究会创办及活动的主旨。

作为爱知大学 ICCS 提交给文部科学省的最终报告书之一，内容主要包括：1、2003-2006 年度 ICCS 先后召开的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文化分组讨论的一些重点论文；2、2003-2006 年度由 ICCS 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多次专题研讨会、讲演会和学术报告会的一些重点讲演、报告和学术论文；3、积极参与本研究会学术活动的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

本报告书由四组论文组成，第一组 6 篇论文，主题是“知识分子、思想与学术文化”。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箫功秦教授的论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集中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问题。他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论战；90 年代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合流；90 年代以后新左派的诞生以及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等，知识分子思想的每一次分化，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影响。作者尤其对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包括其基本的思想理念、新左派的两个类型以及各自的特点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说。作者最后指出，不断展开来的左、右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斗争，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政治走向发挥重要、持续和微妙的政治影响。

日本神田外国语大学兴柁一郎教授在其论文“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争论的背后”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延续至今，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改革使得中国实现了辉煌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贫富差距和政治腐败。那些较少受惠于改革的人们开始质疑改革，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开始时只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但现在已广泛地见于国民舆论之中。胡锦涛政权对于此种动摇改革的动向，深感危机，因此，提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新的政治路线。中国果真能够纠正历来的官僚腐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并走向更加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和谐社会吗？可以说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在预测中国的未来前途时具有重大的意义。

夏威夷大学 Kate Zhou (周晓) 副教授的论文 *Chinese Intellectuals Fighting Ideas in Global Context*，主要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争论的焦点及其与“全球化”大背景的关系。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新左翼和新右翼（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争论，既有国内改革进程和多种社会现实问题的依据，同时，也有明显的国际化因素或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作者提醒说，新左翼思潮的泛滥，有可能从根本上弱化在中国尚且根基不稳的市场经济之自由主义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梦阳研究员的论文“鲁迅与胡适在现代中国”，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于在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位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鲁迅和胡适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作者认为，鲁迅和胡适都是现代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这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言论中得到很好的证明；但鲁迅和胡适又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例如，鲁迅非常重视内省，而胡适则重视通过引进西方思考方式来进行精神启蒙；鲁迅和胡适均曾受到海外文明及其思想的影响。

响，但他们所分别接受的欧洲大陆和英美式文明的不同也是导致他们之间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新的中国文化的建设事业来说，应该彻底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鲁迅和胡适的偏见与误解，把鲁迅学和胡适学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捷径。

论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化复兴的概观”，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视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他认为，这种整体性的变迁生动地展现于从大众世俗文化生活到上层精英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其中学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乃是渗透于这一整体变迁过程的灵魂。该文着重对文化构成中处于中枢地位的学术文化作了概括性介绍，清晰地描绘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学术文化的复兴状况和进程，其所涉及的人文学科领域有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社会科学领域则有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法学研究。

第二组 9 篇论文（包括讲演），主题为“历史传统、宗教和近代化”。

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学者刘再复教授在其题为“中国‘尚文’的历史传统”的讲演中指出，在中国数千年来的文明史上，从未形成过欧洲式（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的向外征服的“尚武”传统，倒是确立了崇尚文化、崇尚和平的“尚文”传统。他认为，此一传统的思想基石，早在公元前的先秦诸子时代就已奠定，而其制度基础则成熟于两汉。之后，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又强化了“尚文”传统。但是，在“尚文”大传统下中国还有一个农民革命亦即以武力解决政权争端的小传统。“告别革命”的命题便是告别小传统、开掘大传统的大思路。中国甲午战败之后，一些知识分子把中国“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缺少“尚武”精神，这种判断并不准确，实际上，中国近代的“积弱”，关键是在明朝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失去和西方同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会。

日本筑波大学松本浩一教授的论文题为“关于中元节的成立：以普度文献的变迁为中心”。论文指出，中国的中元节和日本的盂兰盆节有着共同的信仰背景，都是供养从地狱被解救出来的亡灵，但一方面是以普度仪式为主，另一方是以祖先祭祀为主，重点有所不同。作者介绍了现在台湾和日本的案例，进而追溯中元节的由来，说明中元节是由各种要素共同构成的。通过对唐宋以来佛教和道教有关“施饿鬼”及“普度”的文献的梳理，论文还揭示了中元普度是如何形成的过程，指出原本是佛教的“施饿鬼”仪式，后来在复交和道教的相互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以所有孤魂和亡灵为对象的“普度”。这篇论文实际上讨论了道教和佛教相互影响、它们如何渗透进民众生活并一直延续至今的问题。

日本神奈川大学小林一美教授的论文“新比较史论、文化文明论：日中两国之国家与社会特质的考察——清代民众运动和江户时代百姓起义的比较”，通过新的文化·文明论和比较史研究的方法论，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农民起义”和日本江户时代的“百姓一揆（起义）”进行了比较，进而考察了两国社会和国家的特质，并对产生其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条件作了分析。作者认为，两国“近世”历史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近代以来两国命运的不同走向，实际上和 16 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白银市场亦即近代文明逐渐浸润亚洲有很深切的关联。在对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结构和世界经济》加以介绍的同时，作者还论及地域及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

东京大学并木赖寿教授在其题为“清末政治社会变革论与日本”中指出，清末的“变法”或所谓“光绪新政”，事实上也曾引起当时日本的关注，日本在出兵义和团战争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当时的变法。为呼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日本曾和中国各地的军政要员与学者广泛接触，同时也有像“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那样扩大日本人在华活动空间的尝试。日本的这些动向当时曾大多受到清廷朝野、地方实权者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从而对清末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等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研究员的论文，题为“文本中国与生活中国：一个清末

士大夫思想与生活两重世界”，她通过对清末民初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士大夫恽毓鼎日记的解读，指出他的思想文本世界和其文化生活世界的两重性，其知识结构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新旧交织，使他与时代的趋新变化具有一定的重合及包容度。在西学涌入、新旧交替的时代剧变中，他力图以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结合来平衡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矛盾，反映了一位信守传统文化理念的知识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应对方式。但作者同时指出，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其道德与知识的撕裂，是身处那个剧变时代知识分子所普遍面对的一个文化困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今中国知识人所依然面对的一个难题。

日本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教授，在题为“雷鸣远与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论文中，研究了20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包括传教方法的变迁和天主教在中国逐渐实现本土化的过程。近代以来天主教的传教主要是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列强所谓“保护权”的庇护下进行的，进入20世纪后，这种传教方法受到广泛批评。遣使会传教士雷鸣远神父（Lebbe Vincent）从20世纪初开始在天津接触当地社会精英，积极进行传教讲演，并通过杂志、报纸等媒体进行传教活动，从而扩展了天主教的基础。雷鸣远神父对借口1915年的“老西开事件”扩张法租界的法国领事和默许扩张的天主教上层持批判态度，同时，他还对认为（中国人）“本性低劣”，故需欧洲传教士指导的在华天主教领导层有所批判，主张建立以中国人圣职者为主体的教会。作者指出，雷鸣远神父的努力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京女学馆大学藤谷浩悦教授的论文“湖南省的辛亥革命与民众文化”，揭示了一个地方在革命前后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真相。通过对湖南辛亥革命时期一则谣言的分析，作者指出，真正支撑当地辛亥革命的是民众文化，如民众中间普遍相信的末日说和救世主即将出现的信仰。这种民众文化还表现为在革命成功后，各地的街巷均挂出白旗，以戏剧武生装束现身街头的青少年等。后来新任的湖南省都谭延闿致力于推进“文明化”，结果就意味着对此种民众文化的抹煞，白旗也就被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所取代。这项研究说明，湖南辛亥革命的原动力是民众文化，但其很快就被乡绅们所提示的文明化理念替代了。

有关中华民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问题，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的论文题为“第五次围剿和国民党的行政及治安组织改革”，他指出，国民党从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之所以取得了摧毁中央苏区并迫使红军主力转移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当时采取了所谓“政治七分，军事三分”的综合配套的政策，一方面在农村实行保甲制，强化地方保安团等民兵组织；另一方面，在行政组织方面主要是在省、县二级体制中导入了行政督查区和行政督查专员制度，虽然这个措施背离了孙文的主张，但却强化了各个地方对红军活动的机动性反应，也强化了地方和国民党正规军配合的能力。作者认为，这些处于非常时期的行政和治安组织改革，对于后来直到1949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曾经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纳尔多·斯莱斯基（Ronald Suleski）的论文“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论述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所发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既有政治体制和政府形态的转变，也有以文字标记方法（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为主的文化变迁，进而还有大众和民俗文化的变迁（以剪辮、废除缠足、服装和新式婚礼等为例）、新的技术体系的引进和发展等，这些变迁的总体指向便是所谓的“现代化”。作者指出，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虽然几经曲折，但上述几个方面的变迁依然都有了持续性和变通性的进一步发展。

第3组6篇论文，主题为“国家、民族关系和民族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的学术报告“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立足于人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认为从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人类

的统一性，乃是一个观念形态上的重大变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发展程度和均衡性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已逾 1 亿，他们主要分布聚居在经济地理视野中的西部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地区。保护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这“两种资源”，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基本理念。报告指出，中国各民族之间，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族际交往日益广泛和密切的时期，这既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整合时期。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小岛祐辅的论文题为“中国多样的民族主义——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说和‘几底主义（Jädidism）’的成立过程”，他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居于中心的汉族和位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二元构图。另一方面，由于作为均质且平等的国民还存在着中华民族，所以，关于民族（nation）的定义及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理解就会产生混乱。近年来，“族群”概念出现，正是尝试克服此类混乱的一种动向，但因此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及其多种多样的民族主义的存在，则有可能在国家统合的名义下遭到忽略。作者通过对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说和近代“东土耳其斯坦/穆斯林的改革运动（几底主义）”的比较研究，发现在作为统合性民族主义而得到肯定的中华民族主义和被否定为分离主义的突厥系穆斯林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却有着一些共同性。作者将它们视为旨在确立本民族文化和社会的认同主体的运动来理解，从而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再探讨。

爱知大学铃木规夫教授的论文题为“作为‘征候’的现代中国——关于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论文集中讨论了“回族”在现代中国的存在意义及其与所谓“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这对于理解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教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指出，当代世界不同地区不断扩展的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社区，在很多侧面均与“认同”问题相交错。从“规模”来看，中国和欧盟实际上都是扩大了的多文化共同体的一种目标，现代中国的“回民”或“回族”的存在和欧盟正在形成中的“欧洲穆斯林”一样，均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征候”。

针对什么是“民族”（nation）这一政治理论的基本而又繁难的问题，作者指出，nation 在包含着“种族”、“信仰者共同体”涵义的同时，还是一种集体表象。Nation 上经常黏附着很多人人为的因素，并不是既存的 nation 创造出“国家”或“民族主义”，往往相反，nation 多是被建构而成，正如是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促生了“中国”和中国的 nation。围绕着现代中国各种民族主义言说的生成与变化，作者以回族穆斯林为例，试图对 nation 的“外部”、通过媒体扩张的 nation 的“规模”、“中华民族主义”的“规模”与“外部”及其可塑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政治理论方面的探讨。

爱知大学松冈正子教授的论文“‘国民文化’与羌族的‘羌历年’”，讨论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国民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羌历年”，其实是 1988 年由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制定的羌族新年，但是，作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一环而致力于复活民族传统文化的政府和民族精英们的意图，却和很多羌族民众的意识有很大隔膜。这主要是因为羌族原先基本上没有独自的新年概念，而构成所谓羌历年之基础的是秋季的“祭山会”，其核心原本是祭祀山神的宗教性活动。在政府主导的羌历年中，祭祀山神的部分被淡化，而主要是将其作为以经济与文化交流为基轴的新节日而提出来的。换言之，羌历年的制定是将民族认同完全纳入国家认同的框架中的一种尝试，但它至少很难通过“新年”这一概念而能被大多数羌族民众所接受。

爱知大学高明洁助教授的论文，题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纽带——内蒙古畜牧业地区的‘苏鲁克’制度”。作者依照时代的顺序，逐一地描述了内蒙古畜牧业地区作为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苏鲁克”（suluke）制度的内涵及其变迁，进而揭示了其所具有的社会协作体系的基本属性。论文指

出，“苏鲁克”制度作为内蒙古畜牧业地区蒙古族社会的基层结构，长期以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不会随着上层结构的急剧变化或政策的变迁而轻易发生动摇，因此，它构成了畜牧业地区蒙古族社会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重要纽带。

爱知大学周星教授提交的论文，题为“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他指出，中国民族学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目前基本的研究范式依然是一种“族别”研究，论文分析了此种范式的由来、依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它有所更新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在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时，研究者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现代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和各民族、各地区社会的“多样性”之间所有关系的复杂性。国民认同和一体化，意味着中国各民族人民之间共享的文化和文明及其相关要素的不断成长，但另一方面，多样性则意味着各民族和各地区社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共同体文化传统的存续与再生产。

第四组 5 篇论文，主题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

国立台湾大学叶启政教授的长篇论文“‘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对中国现代化的磁滞效应”，主要讨论中国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的关系。他指出，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改造基本上是朝向贯彻共产社会之理想结构形态，亦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方向前进着。过去种种政治运动基本上均有实践（或“盘整”）这条基本路线的意涵，几十年来确实也为整个社会奠定了一定的结构基础。但当政府全力推动以“现代化”为名的改革开放时，首先受到冲击（也是面临之最大阻碍）的，即是此一既成结构模式所衍生的磁滞效应，这种效应最明显的莫过于，在传统“政治挂帅”之多维二元身分等级体制依旧拥有主导权的情况下，“干部”这一阶层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获利者。他们既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主力，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副教授的论文“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户口、阶层和流动机会的获得”，他指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市场转型的社会影响正在逐渐增强，但原有体制的结构影响依然继续。户籍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社会制度安排，对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仍具有显著性，虽然市场转型对此种制度性壁垒已经产生一定冲击，但户口因素对社会阶层地位以及社会流动机会的影响仍然显著。作者认为，眼下正在推进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时也是中国整体的社会生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非重要的侧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研究员，在其论文“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和政治参与”中，对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与社会分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他尤其集中地探讨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相关问题。私营企业主可以被定义为个人拥有企业财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而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职业。私营企业主已经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的阶层特征、阶层意识及其他的政治参与愿望与政治参与方式，均很有特点，也非常引人关注。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高丙中教授的论文，题为“精英、大众与民间的文化分层”。作者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大约在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从整体论向分化论的转变，后者从差异（阶级、价值、目的）出发看待群体、阶级如何通过文化而采取社会行动。这种转变也就是文史哲的研究方法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转变，它同时也恰好伴随着中国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伴随着文化内部的急速分野，其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社会分布和话语竞争是突出的社会事实。这篇论文概述了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在现当代史上经过的几次变化和呈现的几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这种文化格局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

上海大学程蔷教授的报告是“上海都市民俗：行进在时尚与传统之间”。作者指出，上海乃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际大都市。近二十年来，其经济发展很快，文化生态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出现了不少新的民俗风尚。这篇报告对上海新民俗的某些方面进行考察与研究，以上海居民结构因素的变化为立论基础，以上海都市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尚问题与传统的关系为切入点和主要视角，从居住形态、信仰方式和节日、婚俗等方面，对上海新民俗的形成、表现和性质做出描述和论析，论证了上海都市民俗富于创新性、开放性和多元互补性，在时尚与传统的张力下不断演进的特色。

综上所述，从社会思想、哲学、知识精英的动向、学术文化的复兴，到历史、传统、宗教、文化遗产和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问题；从国家、民族关系到精英、大众与民间文化的分层，再到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都市文化的变迁，收入本报告书的各篇论文所分别讨论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广泛的，它们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或专业领域，采用了非常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同时也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学术立场。所有这些研究涉及到现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各个层次与侧面，这主要是由于“文化”范畴的宽泛和难以限定，但同时也确实反映了近四、五年来，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文化研究会各种学术活动的主要成果。我们希望这些成果能够成为今后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2007年3月

中国与亚洲·世界的文化共生研究会调查主任
张琢